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

潘泽泉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5)

摘要: 时间和时间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主题, 时间具有认识世界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确立与发展, 超越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线性发展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依附论”及“世界体系论”等基于时间线性叙事的现代化的经典论述和基于“世界帝国主义时间”的现代性隐喻, 实现了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时间地理学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时空高度压缩、多重叠加、并联式与跨越式发展的事件性时间性过程, 是一个整体性与局部性、连续性与断裂性、渐进性与飞跃性不断推进的变迁性时间性过程。作为中国时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建设美好人类社会、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拓展世界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的时间多样性、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时间向度; 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2-0029-13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分析大变局的时间向度和发展趋势, 对于揭示转型社会的本质特征、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 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 重新思考现代化推进背后蕴含的时间向度、时间机制与时间秩序, 全面反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 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现代化时间社会学的范式转型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和范式重建的知识史语境中, 从马克思到涂尔干, 从齐美尔、帕森斯到阿伦特, 从埃利亚斯到吉登斯、布迪厄、卢曼、福柯和贝克等, 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在现代性叙事中都涉及了时间问题。在西方社会学家们看来, 现代性蕴含着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 一种面向未来而不是朝向过去、寻求历史意义的时间意识。齐格蒙特·鲍曼指出, 现代性是时间的历史, 当我们从时间角度去思考现代性时, 就意味着要把历史事件设想为直线型和演化系列的事件性时间, 以此作为前提来讨论它们在空间上并存的时间性关系^[1]。布莱克认为, “现代性”是在时间上用于描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2]。西方现代化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理性不断进化的历史”,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 还是文化结构, 都具有不断进化、“理性化”的时间特征, 都是逐渐朝向“理性化”的累积性时间进化过程, 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变迁性的时间简史, 文明正在逐步朝着理性化和逻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成为明显的事实^[3]。

收稿日期: 2024-12-01; 修回日期: 2025-02-09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20&ZD149)

作者简介: 潘泽泉, 男, 湖南武冈人,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时空社会学、发展社会学, 联系邮箱: panzequan@sina.com

社会科学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社会现象的时间性叙事、时间隐喻以及时间的社会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在研究政治,权力关系,社会分工,政治机构,社会发展动力、轨迹和变化的子领域中,建构一个把时间作为权力要素的概念工具箱和知识表征,将时间维度系统纳入现代性关于权力关系、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理论范式中,无疑对于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和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意义。在现代化过程中,时间往往与知识、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时间往往通过知识、权力与真理机制,通过一种“时间权力装置”或“权力装置的时间化过程”,影响社会发展。可以说,时间性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研究主题,时间具有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我们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将时间向度作为关注对象或社会现象研究中的解释维度、社会发展的动力条件和实现机制,从复杂的经验现实中抽出共同的时间分析要素,形成经验或概念上的时间分析共同点,形成关于时间的经验命题,建立一般化的时间分析概念,通过范畴化,建立宏大的解释所有社会现象的抽象概念系统,扩展一种时间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同时将时间纳入现代化理论中,将其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可以说,时间不仅是现代化理论分析和经验比较的概念工具和知识谱系,也是现代化的动力、工具和机制,时间参与了现代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一种时间社会学转向,在知识论与本体论上将时间作为一种方法论、认识论工具,帮助我们把握当代世界现代化时间结构的社会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我们需要思考在现代化过程中,“以欧美为中心”的线性的现代化持续时间或同质性的时间是如何被构建的和如何分配社会权力的?为什么在授予、拒绝和行使权力的政治程序中如此频繁地插入时间的叙事?有必要在批判性抑或反身性视域中评价西方国家干预、支配或宰制非西方国家时间的方式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先发国家又是如何通过时间机制支配或控制后发国家的时间,是如何通过“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落后与发达”等时间向度来干预并重建时间秩序的?又是如何为合法化控制或统治的目的设定世界帝国主义时间的?时间又是如何在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被创造、管理和规训的?我们还要重新思考时间如何被理解为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被创造和管理的政治物品”^[4]。因此,我们需要引进一种作为权力装置的时间机制、时间权力的谱系学分析和时间的修辞学分析,思考基于现代化的时间隐喻,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视域中实现跨经验材料和跨文化的时间对话,重新区分帝国时间、国家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

二、“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时间向度及其话语建构

现代化的时间过程是一个延续性、非延续性或断裂性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基于时间权力谱系被重新建构的话语结构化与时间殖民化过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以“现代性”来概括现代化的本质,在他看来,现代性指发端于17世纪的欧洲,萌发于启蒙运动之中,借助理性、革命和市场的力量,包括“以欧洲为中心”向世界各地不断蔓延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组织模式、认知和内在的精神结构、价值观和信仰、态度和行为基调等。现代性强调个人主体意识觉醒,是历史发展自主性、连续性、反思性、否定性、批判性与自反性的结果。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将时间和空间重新组织起来,经由区域化和例行化,连接在场与缺场,通过时空延伸,将各种活动、关系与整个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时间和空间既是现代性的动力与机制,也是现代性的结果。

(一)“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时间机制与时间意识形态

“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时间机制表现为一种线性进化的时间序列,一种基于时间霸权、时间政治或时间意识形态的时间谱系,或者是一种基于时间的“同一性霸权”或“同一性神话”。现代化起源被迫追溯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兴起之时,它进而被认为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具有同质性、方向性、单一线性的现代化时间浪潮。欧洲经由启蒙运动,借助科学技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宗

教变迁等现代性力量，让“西欧”变成“西方”，西方主导叙事的现代性，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名词，滋生出一种“普世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情结，一种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傲慢与偏见。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叙事被视为一种普适性经验，现代性被视为西方理性的一种历史性、普适性的表现形式，欧洲主导叙事的现代性强调欧洲的历史方向和社会发展模式是非欧洲地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期现代化社会思潮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代表人物有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维斯特、英格尔斯、列维、麦克莱兰及艾森斯塔德等。这些社会学家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看成是对立的两极，现代化就是在两极之间不断以现代性要素置换传统性要素的时间过程，它描述了现代社会、现代人的一系列特征。他们认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不发达的原因在于其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对现代性的抗拒，他们将西方现代化道路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唯一道路，认为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是西方化。他们的现代化过程必然是一个以西方外来文化入主、替代、淘汰本土文化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伴随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现代化模式被普遍认为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终结了其他可能性，具有无条件、绝对的对外扩散的道义优先性^[5]。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就是摆脱不发达状态、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6]。在“西方中心论”的“帝国主义时间”的时间霸权和时间意识形态中，“现代化”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等同于“西方化”。许多非西方国家基于西方的时间意识形态，盲目追随西方现代化道路，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最终陷入以西方为核心、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边陲的“依附性发展”陷阱。马克斯·韦伯基于西方新教伦理、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提出单向线性关联性论断，提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均缺乏此类文化传统作为资本主义的启动因素，以此来解释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7]。

事实上，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逻辑和资本逐利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给人类与世界带来了巨大风险和严峻挑战。基于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的时间性和资本逐利逻辑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导致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盛行，带来了生态破坏和经济增长的停滞，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严重的系统性威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结构性矛盾^[8]。赫伯特·马尔库塞通过研究工具理性下“人为物役”的状态，揭示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悲惨宿命，即发达工业社会下人“非自由”的状态“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9]。服从于资本增殖逻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使人的主体性从属于物的主体性，基于资本逻辑、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荒芜、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主客体分离、旷世孤独与迷茫等，同时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环境、资源与生态危机，人口生存与发展危机，全球不公正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盲目落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时间意识形态，必将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我们需要舍弃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的时间霸权，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所谓“世俗进步的时间观”，即赢者创造、赢者自我论证的进步史观。单向线性、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时间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时间”，将西方视为世界与历史的时间本质和主体性存在，导致了后发国家现代性的边缘化，引发了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焦虑。事实上，“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发展模式，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10]。随着欧洲主导叙事的终结和世界权力中心的多极化，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权力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未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快速崛起，意味着“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时间机制与时间意识形态的终结。

（二）全球权力转移与全球秩序重构：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间过程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具有世界时间意义的历史潮流。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出现了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欧洲主导叙事的现代化主导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

叶,现代化除了在欧洲,还迅速向欧洲以外的地方扩张,出现了以日本和早期苏联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化高潮。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产生了一批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从而掀起了现代化的第三次高潮。大变局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国际秩序重构与新格局形成的时间过程,是一个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与世界多极化新格局形成的时间过程。伴随欧洲主导叙事的终结和世界权力中心的多极化,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其国际话语权、政治影响力快速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均衡。可以说,我们正身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从“一超多强”到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

从历史纵深看全球现代化运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力源于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来自工业革命与技术变革中的生产力主导权。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760—1840年,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第一次技术革命率先在英国发生,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40—1950年,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第二次技术革命率先在美国和德国发生,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头号强国”,确立了“全球霸权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50年代至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掀起了新经济革命的高潮,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率先从美国开始。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主的技术革命促进了互联网及移动通信产业的迅速发展,美国借此“执世界经济之牛耳”。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表现出了西方国家作为“先发国家”的先发优势和时间意识形态,西方国家代表着“中心”“进步”和“文明”,非西方国家是“后发国家”,存在“后发劣势”,代表着“依附”“落后”“贫困”“愚昧”和“野蛮”。后发国家存在着强烈的“后发劣势”带来的“时间自卑情结”,存在着某种时间上的“存在性焦虑”“发展性焦虑”和“速度焦虑”,存在着一种“迟发展效应”带来的“集体性时间焦虑”。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权力转移与全球秩序重建。科技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打破了全球化过去主要在西方国家中循环的历史逻辑。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引发了西方的集体性时间焦虑。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智能化为核心,以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大数据、生成式AI、物联网、机器人、决策树、随机森林、生物技术以及量子科技等技术为代表。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为全球分工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将重塑世界产业格局。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着变化,现有国际秩序、经贸规则、国际体系等也必然要体现后发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力量。尤其是亚洲国家在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亚洲国家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国家相形见绌。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后发国家的崛起同样引发了西方国家集体性被赶超的“时间焦虑”“发展性焦虑”和“存在性焦虑”。后发国家能够主动地加入并适应新的全球化进程,从“一超多强”到“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的全球权力秩序重构象征着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终结,象征着西方主导叙事的终结。

(三) “范式型力量”与“文明型力量”:以西方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时间话语叙事

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张现代化模式上的西方化,即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间隐喻,时间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叙事把欧美现代化看作一种“范式型力量”和“帝国主义时间”隐喻。在西方现代化国家看来,欧美的“范式性力量”是欧美道德优越性的体现。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到信息化的“串联式”线性发展过程,是一个通过时间“同一性霸权”征服形式建立社会等级制度的时间过程。欧美的“范式性力量”立足于欧洲近现代史,站在传统强国的立场上,蕴

含了“时间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时间”的隐喻。

欧美“范式性力量”叙事源于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预言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预言提出一个普遍的论断，即一个新兴强国挑战一个守成强国时，一场战争往往在所难免，即战争不可避免论^[11]。基于“文明冲突论”提出的“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试图为现代性在全球的推进提供一张新的“文明圈”认知地图和世界秩序图景，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取决于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圈”，即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在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中，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12]。在亨廷顿看来，在不同文明之间存在“文明的断层线”，这些断层线之间潜藏着冲突的危险，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亨廷顿早期将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预言中华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12]。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西方文明和植根于其上的民族和国家以一种“征服”和“敌视”的哲学评判其他文明。“文明冲突论”试图维护西方文明和防范非西方文明，坚持“以‘零和思维’指认文明间‘遏制—被遏制’‘上升—下降’的二元对立”^[13]。这是西方文明或西方中心主义者对后发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的遏制策略。我们应警惕让其他文明“西方化”的幻想，尊重并承认文明之间的差异，以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必然导致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形成“中心—半边陲—边陲”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通过资本输出、全球扩张、政治控制、军事干预等方式构建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依附”。

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正在破除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预言和“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关系的现实，揭示了资本逻辑下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存在范式，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1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国强必霸”逻辑，是一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和平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反对“对外扩张掠夺”，坚持天下大同、平等互利、和合共生、合作共赢和命运与共，抛弃了西方零和博弈思维与对外扩张的资本增殖战略，走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型力量”和“新轴心文明”，体现出文明的“互构性”“包容性”“多元性”“差异性”。文明型力量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承认差异，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15]。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不是对抗或改造，而是坚持“不冲突、不对抗、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理念，构建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四）“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基于资本增殖逻辑的全球时间地理学

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的提出，使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中心—半边陲—边陲的时间—空间叙事取代了欧洲现代化的单一时间叙事，在这种时间和空间隐喻中，空间和时间一样，同样是现代性生成的机制和动力，空间开始纳入现代性的时间过程，走向一种更深层次的时间地理学解释，发达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时间地理学过程是“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过程。“中心—外围理论”“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等论断可以被理解为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即资本积累的时间地理学的问题，是一个基于空间的时间结构、基于空间的时间政治的全球历史地理学、全球时间地理学抑或差异政治地理学问题。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宰的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通过资本政治或资本剥夺在边缘地区复制不发达状况的时间和空间过程，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半边陲结构空间生产、空间宰制的前提和必然结果。

“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强调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分工、空间权力关系、先发与后发性、迟发展效应、依附发展及世界体系的时间地理学视域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关系,经由现代性的时间、空间机制构建出由边陲国家、半边陲国家、中心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將资本主义世界看作一种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组成的三层结构体系^[16],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对应的空间等级分布是维持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或政治经济秩序赖以运转的基础和前提。在国际政治体系、世界性劳动分工和世界性商品交换中,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居于体系的“半边缘”,亚、非、拉等落后、发展中国家被动地成为受控于“中心”的“边缘”。依附论者认为,那些落后国家持续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一直维持着一个“依附”“边缘”的地位,“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发展”或“脱钩发展”。在这种持续垄断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不平等关系中,要么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或中心—外围的前提下走“依附性发展”道路,要么从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国际分工格局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走出来,基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立足本国实践,寻求自身发展道路。“依附性发展”和通过“脱钩”求得发展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即中心与边缘的地位是固定的,而不是可以变动的^[17]。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全球秩序重构与国际体系转变等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加速引起全球关注,学界开始摆脱中心与边缘、现代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时间二元叙事,提出了“多极化世界”“一超多极”等新的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张体现出对“中心—外围”“依附式发展”“脱钩”“西方中心主义”等论断的资本逻辑批判和对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诉求。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南亚、拉丁美洲的一些新兴国家立足本国实践,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实现了群体性崛起,带来欧洲主导叙事的终结和世界权力中心的多极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事实说明,任何国家在中心—边缘体系中的位置是可以改变的,也证明了依附论的解释框架缺乏解释力。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超越了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定位,实现了对“增长崇拜论”“资本增殖逻辑的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回应了当今世界各国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盼,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单一性质定位、霸权周期律的世界历史叙事、变革世界体系的理想主义方式、改变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有着多重意义上的超越,为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了富有创造性、可行性的中国方案^[18]。

(五) 民族国家与世界民族主义:作为自反性话语秩序的时间建构

民族国家和世界民族主义的出现,蕴含着一种基于未来时间机制的政治化叙事,体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出现源自欧洲现代性的知识前提与技术理性的扩张,它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现代性民族自决与自治、民族共同体认同和多元文化主义历史现实而形成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很多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通过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实现现代国家系统的构建。经典的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论断表现为从启蒙运动的民族国家到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消亡,再到世界民族国家出现的时间意识形态连续谱。

一方面,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以民族国家建立为前提,民族国家追求国家暴力的时间合法性垄断与国家时间权力的高度渗透。经典的社会学家普遍把现代化的时间性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即现代化的时间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只有在建立民族国家后,才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政治参与扩大和社会整合。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民族国家具有清晰的领土边界、明确的成员身份、独立的国家主权及排他性的行政管理等普遍性特征^[19]。民族国家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基于体制、文化或族群等现代性的民族自决,以时间与空间为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反思性监控能力”,经由反思性监控、时间与空间的延伸对领土边界范围内的任何事物实施严密的行政监控,经由共享的价值、历史、文化或语言,实现对体制的认同,以此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社会发生了

深刻的结构转型，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转型的现实基础是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增长及其控制方式的变化，包括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强化、国家暴力的合法性垄断与国家权力的高度渗透，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现代性元素高度融合。事实上，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动力不仅源自垄断资本的逐利本性，也源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本性，即试图经由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一个“理想民族国家”。基于此，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没有终结民族国家，而是在时间上实现了从“前民族国家”时代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19]。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不同学者基于自反性现代性逻辑，提出了民族国家过时论、空壳论、消亡论等观点。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的“第三次浪潮”断言“民族国家崩溃”，某个地方、某个州或某些民族可能要求独立或分裂，托夫勒称之为“危险的时代错误”。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他又重新划分了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20]。在鲍曼看来，全球化将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使世界进入一个中心缺失、控制台缺失、董事会缺失和管理机关缺失的高度不确定状态，全球化是“新的世界无序”，在全球化的狂浪冲击下，以民族国家为支点的政治秩序将成为历史^[21]。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这一引人注目的潮流正在改变政治、经济、社会在同一民族国家内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的历史格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正在脱离其政府管控而演变成一种跨国经济形式，国家不再构成全球交换关系网络中的要点^[22]。马丁·阿尔布劳认为，全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民族国家理论的更新，这是一种把人民、民族、社会、经济诸要素专断地包含在特定领土边界范围内的概念框架，它只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关，传统的民族国家理论已无法再适应全球时代的状况^[23]。

事实上，民族国家并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即世界民族主义形态。为应对国际危机、全球不确定性、极权主义、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风险，在冷战结束后，一种新的世界民族主义、技术殖民主义浪潮正在形成。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尤其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民族国家的终结，民族国家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作用更为强化，不仅继续扮演着国内社会经济诸关系的调节者和塑造者角色，而且成为应对国际危机、化解全球风险必须依靠的政治力量。因为国家依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有效的法律执行者，国家权力的高度渗透与民族国家的基础性地位在强化。事实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自反性逻辑的、相互促进又彼此矛盾的“共生关系”。正如鲍曼所言，在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由于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民族国家的边界逐渐被打破，自由经济逐渐摆脱了政治控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由结盟、联盟或垄断，超越独立国家的边界，创造或维持了一个新的、独立的经济或军事共同体，从而使民族国家转变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保安，即走向世界民族主义新形式。与资本的全球化合拍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弱、资源较不丰富、“政治上独立”的新领土实体创建起来，反映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我们需要超越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民族国家，超越一切以欧洲为中心的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超越西方中心的世界民族主义，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安全复合体”或“多元的安全共同体”来实现“安全相互依存”，“安全复合体”表现为多元行为主体构成的各种各样的次集团、跨国公司、非正式组织和共同体。

在基于应对全球化风险的自反性现代性进程中，建构主义的国家安全观、自反性风险话语建构背后蕴含着未来时间的政治化叙事，体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形态，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和扩张。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安全化”措辞背后是一种更强烈的时间政治合法化过程，发达国家以未来时间的“国家安全”“生存性威胁”“风险的不确定性”的名义占有全球资源并以其剥夺发展中国家自由发展的权利。为了压制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或运用权力控制

更多机会,或以未来时间的“安全威胁”“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消除不确定性”为借口来要求更多权力,导致大部分国家被少数力量统治的合法性被重新建构起来。正如哥本哈根学派所言,并非“安全越多就越好”。多数已无政治、军事威胁之虞的西方国家通过提高安全的门槛,使“安全”成为西方国家强化技术垄断、技术霸权、霸权联盟的一种“时间符号暴力”或“时间象征权力”,形成了欧洲建构主义安全或以美国为中心的建构主义安全。与20世纪后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一起,基于时间风险话语“安全”与“非安全”自反性的时间霸权或虚假意识形态大大挤压了非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使世界各国的主权呈两极化发展趋势,即西方各大国尤其是美国借助反恐和全球化大大增强了主权能力,形成了所谓“超级主权”,而其他各国的国家主权缩减和退让,导致了“有条件的国家主权”^[24]。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与中国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观将新时代的文明发展置于人类文明的高度之上,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线性时间观的局限性和时间意识形态偏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新文明起源,彰显出强大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真理性力量、实践价值和原创性贡献,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意识形态舆论场域中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彰显了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走现代化之路的信心和决心。20世纪70年代,伴随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具有无条件、绝对、对外复制的道义优先性。对于广大落后或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摆脱不发达状态、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开启人类文明新纪元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确立与发展,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的时间意识形态,站在世界性和全球性高度,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从人类文明的高度,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将人类文明引向新纪元。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模式的摒弃与超越^[25]。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创性在于克服了“后发劣势”,后发国家的“迟发展效应”“依附式发展”和“脱钩发展”等时间性元叙事,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从时间上重新标识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改写了“世界体系”“依附论”“脱钩论”“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化时间意识形态,消弭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历史悖论。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旺盛的时间生命力,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基于“中国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自中心”,立足中国实践,坚持中国道路主体性,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时间性文明,它类似于一种“百花园”或是阿多诺式的时间“星丛”概念。西方现代化走的是一条西方国家压榨发展中国家、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支撑西方国家发展的不平等道路^[26],是“西方中心主义时间”的发展陷阱。基于“中国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性叙事超越了“国强必霸”逻辑,是一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和平现代化新路,强调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价值要义,以社会主义时间文明构建人类文明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型力量”和一种新的“文明体国家”的形成方式,摒弃了

方法论上的时间民族主义，展现出人类文明时间新形态。西方现代化道路建立在对外扩张侵略的基础上，是一条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的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文明冲突论”，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抛弃了西方的零和博弈思维与对外扩张的现代化老路，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27]。中国式现代化既立足中国实践，突出主体意识，又把握时代脉搏，摒弃了方法论上的时间民族主义，保持着开放的时间问题意识，既可以推动本国发展，又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8]。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中国同样不同于近代欧美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殖民体系，从时间上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启蒙”和“解放”的双重意蕴。“启蒙”表现为从新的“生态启蒙”“风险启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家安全、全球治理到全球文明倡议。“解放”体现为精神解放、党的自我革命、从自我革命到社会革命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基于未来时间的一种新的“文明型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不是对抗或改造对方，而是承认差异，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多元文明类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互鉴。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互利共赢”“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体现跨越式发展新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时空高度压缩、多重叠加、“并联式”与跨越式发展的时间过程，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早发内生型”“一元线性发展”和“串联式发展”的单一线性时间模式。西方主流学界将现代化时间问题理解为一元现代性的时间问题，即单一线性时间问题。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化时间理论将西方社会发展的这一时间模式视为普适有效的，认为所谓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过是时间轴上的同质化过程，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早发内生型”“串联式”的时间发展过程，体现出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到信息化的单一线性的时间发展过程。源自欧洲的一元现代性主张以西方现代性为内核的全球现代化时间体系，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现代性时间才具有普遍性和价值，现代化就是西方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和运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

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人类社会的高度多样性和多重时间性逻辑，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早发内生型”“串联式”发展的单一时间线性模式，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和文明成果，以后发优势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时空交错中的叠加发展，打破了现代化发展的线性逻辑，体现出全方位、均衡式、并联式、跨越式发展及多重时间性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时空高度压缩、多重叠加、“并联式”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目标和任务的高度叠加性、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压缩性、要求和手段的多重协调性、进程和阶段的后发赶超性，呈现出跨越式、叠加性、后发赶超性发展的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展现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曾为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步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做了理论预设，即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阶段，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29]。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的革命道路是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创造，是对践行东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改革开放时期的改革开放道路带领中国人民积极、迅速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在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过程中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对接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是对“逆全球化”的超越，开创了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美好前景。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性呈现出整体性与局部性、连续性与断裂性的新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阶段性与接续性、连续性与断裂性、渐进性与飞跃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

性与局部性、追赶性与超越性、非均衡性与均衡性发展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过程蕴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能性与必然性、一般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历史选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具体时间逻辑展开,有力地驳斥和破除了“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依附式发展”等错误的时间观点和论调^[30]。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时间上的“从属”模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开创了时间上的“自主”“平等”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循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间轨迹,一步步走向全面、和谐、协调、开放的现代化道路,其时间性具有鲜明的外生—学习性、后发—追赶性、务实—渐进性、阶段—接续性、时间的断裂性与时代全面性等特色^[31],其成就具有世界性,经验具有开创性,模式具有引领性,“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32]。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分阶段、有步骤推进的时间过程,体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时间政治过程,它立足中国实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从传统时间性向现代时间性的过渡。我国小康社会分几步走的国家战略体现出时间是国家政治动员的概念工具箱,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过程和阶段性目标充分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循序渐进的时间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从最初的“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到“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时间性变革。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渐进性转变,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全面提升的伟大跨越,是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的系统时间提升。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秉承辩证思维,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的时间目标^[33]。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新征程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以此为基础明确了建设“美好社会”的时间战略安排,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渐进演进逻辑。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自主探索形成的、始终围绕民生、渐进式推进的现代化建设路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发展中国家通向现代化贡献的中国时间智慧和中國时间方案^[34]。

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特点,体现出一种事件性时间的特点。渐进式改革基于现代化战略的宏观性、长期性、稳健性及地方发展的非均衡性,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考虑由事件引发的结构转型,以“路径依赖”“全局偶联”“历时的因果异质性”为特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调适路径,通过选择一部分地区作为政策试点,先立后破,先行先试,率先探索,循序渐进,分步推进,最后全面实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改革到行政改革以及各领域的改革,从深圳、珠海等试办经济特区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及沿海沿江开放,再到建设自由贸易区,均体现了“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局部推广—全面推行”的渐进式推进策略^[35]。飞跃性变革体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变,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的过程,体现出根本性的、跨越式的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变迁,表现出革命性突破与系统性重构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新的飞跃”“自我革命”“社会革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征程”“我们进入一个大转型的时代”等话语叙事体现出中国在新时代正面临着一次质的飞跃、一次飞跃性的时间过程。

(五)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由“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的新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后发国家的“迟发展效应”“后发追赶型”与赶超型的跨越性时间特点,是一个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的时间过程。从历史推进的“事件性时间性”上来看,中国式现

代化体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目的性与计划性、后发性与超越性的特点，也体现出从外源型推动向内生性发展转变的特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与“早发内生型”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曾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难处境，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性危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蒙强调政治解放和民族独立，存在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现代性在中国只是以碎片化、局部性的形态出现在个体的意识中，现代性处于本质上的“不在场”和“无根状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先声，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工业文明、科学技术与民主思想，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但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生存性危机，救亡压倒启蒙，反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了。事实上，早期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体现出“迟发展效应”，具有“外生型”“后发型”双重属性，是“挑战-应战”或“刺激-反应”式的现代化，是一种受到外部冲击、影响而“被动”开始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中被动起步的，启蒙是为救亡服务的。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由简单移植、模仿到理性借鉴和审慎吸收的过程，随着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由“外源式推动”走向“内生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及中国特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基础上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当今，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风云动荡，风险与挑战并存，逆全球化、恐怖主义、新结盟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大行其道，我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中国实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自主创新，经由“内生型”动力^[31]和内生增长机制，通过深厚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性，走中国自主发展之路。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确立与发展，超越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线性发展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论”等基于时间线性叙事的现代化论断和基于“世界帝国主义时间”的现代性隐喻，实现了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时间地理学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时空高度压缩、多重叠加性、“并联式”与跨越式发展的事件性时间性过程，是一个整体性与局部性、连续性与断裂性、渐进性与飞跃性不断推进的变迁性时间性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建设美好人类社会、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拓展世界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多样性、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建设美好人类社会、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贡献了具有世界时间意义的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的“帝国主义时间”模式，经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世界时间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治理、包容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都旨在加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向全世界传播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为建设美好人类社会、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中国力量，彰显了一个时间上不可逆转的包容式发展、命运与共、和平发展世界时代潮流的到来^[36]。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拓展世界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的时间多样性，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具有世界时间意义的“中国经验”。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化代表了一个世界性的时间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巨大的时间变革，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形式^[37]。“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代表着一种超越“帝国主义时间”的新的时间文明形态^[38]。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是世界历史迈向新纪元的伟大里程碑。人类文明形态随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不同，“发展方式变迁及其所带来的生存方式革命从深层次上决

定文明形态变革”^[39]。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确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在后发国家创造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时间新形态,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40]。

参考文献:

- [1] 叶成城,唐世平.超越“大分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时空视角下的历史、方法与理论[J].学术月刊,2021,53(5):77-86.
- [2]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 [3]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4.
- [4] GOKMENOGLU B. Temporal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directions for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ime[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2, 73(3): 643-653.
- [5] 赵英红.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J].理论建设,2020,36(4):43-49.
-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
- [7] 韦伯.中国的宗教[M].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8] 孙乐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一种可能的建构方案[J].求是学刊,2020,47(6):33-42.
- [9]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8.
- [10]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11] ALLISON G.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M]. Boston, MA and New York, N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1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13] 刘超,吴海江.比较文明论视野下中国道路的三重超越性[J].理论视野,2021(3):43-48.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4.
- [15] 于安龙.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底蕴、实践经验与世界意义[J].思想教育研究,2022(7):73-79.
- [16] 王志刚.世界体系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J].东岳论丛,2019,40(3):176-183.
- [17] SHANNON T 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 [18] 孙来斌.超越“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式: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意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1):104-111.
- [19]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0]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201.
- [21] 鲍曼.流动的现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22] 沈红文.哈贝马斯谈全球化与欧洲民族国家[J].国外理论动态,2000(11):16-19.
- [23] 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4] HOBSON J M. Decolonising sovereignty: Globalisation and the return of hyper-sovereignty[M]//SCHUETT R, STIRK P. The concept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5-162.
- [25] 马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更好发展“中国蓝图”[J].哲学研究,2022(6):13-21.
- [26] 连广宇.破解传统现代化困境的“中国方案”:略论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东方智慧与全球视野[J].学习与探索,2017(1):1-8,173.
- [27] 龚云.大历史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世界历史意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8):4-9,79.
- [28] 徐建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脉络与世界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22(3):21-31.
-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0] 付文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J].探索,2022(3):15-28.
- [31] 孙照红.“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特色和经历[J].中州学刊,2021(2):13-19.
- [32] 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94.
- [3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4] 黄建跃.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演进[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1, 28(1): 153–154.
- [35] 陈家喜, 邱佛梅. 主动式、递阶式、渐进式: 政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逻辑[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2): 123–129.
- [36] 段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实践的世界意义[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8): 38–43.
- [37]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 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7.
- [38] 刘洪愧, 邓曲恒.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22(6): 11–24.
- [39] 袁祖社. 当代文明形态变革之主题自觉与中国式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逻辑[J]. 学习与探索, 2016(11): 7–14.
- [40] 王伟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 哲学研究, 2022(9): 5–12.

The dimension of tim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AN Zeq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2275, China)

Abstract: Time and temporality constitute a common subject in both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time boasting of its ont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comprehending the world.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have fundamentally overturned those West-centered classical assertions based on time-linearity narrative concerning modernization, including theories of “Monistic Linear Development”, “the End of History”,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ependency and Adsorption”, and “World System Theory”. This path has also subverted the modernization metaphor of “World Imperialism Time,” and transcended universal Time Geography which has centered around the West.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temporal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compressed space-time, multiple superimpositions, parallel-and-leapfrog development, and is also a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wholeness and localization, continuity and rupture, gradualism and radicalism.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ath, as China Time, provides China’s experiences for the world in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solving such issues as human mutual development, expanding world modernization path as well as time varie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boosting the modernization path for post-development countries,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achieving worldwide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imension of time; Chinese practice

[编辑: 郑伟]